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FOREIGN HISTORIOGRAPHY ON MODERN CHINA
22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二十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30号

责任编辑: 丁如筠

责任校对: 吴 言

封面设计: 鹿耀世

版式设计: 王丹丹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Guowai Zhongguo Jindaishi Yanjiu

第二十二辑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编码 100720 电话 4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10.875印张 2插页 279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500册

ISBN 7-5004-1103-8/K·179 定价: 6.45元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稿约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史学动态研究室主编的学术刊物，本刊宗旨是译介国外有关中国近代史(1840—1949)研究的成果和动态，并以国内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人员及其他关心中国近代史的读者为主要服务对象。

外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史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本刊译载他们的文章供国内学者参考借鉴并不意味着同意其观点。

本刊主要刊载有关国外研究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论文，以及外国学人和学术机构介绍、新书评介、学术动态等方面的文章，欢迎学界惠稿并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来稿要求：

一、来稿请用横格稿纸誉写清楚；引文、译名等务必查实并注明资料出处；数字和日期均用阿拉伯数字标写；字体和标点应符合规范；注释采用当页脚注；外文用印刷体书写。

二、译稿须附原文；译文中的人名及书刊名均须加注原文。

三、写明真实姓名、工作单位、通信地址及邮政编码。发表时署名听便。

四、来稿一经决定采用，即发函通知。稿件发表后，按规定致酬并赠当期刊物二份。如不采用，妥为退还。请勿一稿两投。

来稿请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邮编：100006

目 录

洋务运动与防务被产·····	魏丕信 (1)
	于必昌译 黄庆华校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产生与宋教仁·····	松本英纪 (16)
	迟云飞译
陈独秀与“二次革命论”的形成·····	江田宪治 (41)
	张晓峰译
光绪初年山西省禁种罂粟问题·····	目黑克己 (67)
	实甫译
烟草工业中中外商业竞争的几个问题·····	高家龙 (85)
	樊书华译
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菊池一隆 (125)
	王玉平译
晚清军事改革引起的社会反响·····	冯兆基 (160)
	郭太风译
1933年东北的抗日游击斗争·····	胡青编译 (194)
何震与中国无政府女权主义·····	沙培德 (206)
	马小泉 张家钟译
社会主义讲习会与亚洲和亲会	
——明治末期日中知识界人士的交流·····	富田昇 (230)
	张哲译

· 书刊评介 ·

20世纪中国：从革命到革命(1895—1949)(上卷)

..... 鲁阿兰 (253)

李国臣译 葛夫平校

天下为公——孙中山及其革命思想

..... 冷绍铨 (259)

万 燕译

一生为中国——回忆录(1937—1989)

..... 费正清 (261)

李国臣译 黄庆华校

一生为中国——回忆录(1937—1989)

..... 格里戈尔·本顿 (268)

范 磊译

追求近代民族主义：章炳麟与革命中国(1869—1936)

..... 曾学白编译 (270)

中国回忆录：蒋介石与抗日战争

..... 曾学白 (273)

· 学人介绍 ·

三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美国历史学家
.....康无为 (276)
陶文钊 樊书华译

· 学术动态 ·

远东研究所的25年.....李金秋节译 (288)

《中国季刊》主编易人.....曾学白 (302)

外国在华机关团名汇(七).....黄光域辑 (304)

洋务运动与防务破产

魏丕信

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

“自强”二字出自《易经》。无论是从字面上还是涵义上看，它都反映了部分法家(至少是参政和现实主义者)代表人物在国家受到劲敌威胁情况下谋求“富国强兵”的传统愿望。不过，从以往的事例看，自强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当时的技术上。直至19世纪末，中国人才开始意识到在军事技术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必要性，因此，“自强”也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

拥有并逐步自己生产西方现代(比中国自17世纪以来使用的欧洲旧式火枪和大炮更为先进的)武器的念头，可以说是中国人在同西方进行初次较量时产生的。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曾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但遭到了朝廷重臣的反对。清兵的武器装备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期间(确切地说，是在1860年)开始西方化的。曾国藩和李鸿章在接受西方援助方面，因为担心会导致西方的政治侵略而严加限制，但在制造枪炮弹药和战舰、购置设备、延请顾问和工程师创办兵工厂、造船厂方面，他们却毫不犹豫。上海兵工厂(即1862年开始筹备、1865年由李鸿章的亲信丁日昌建成的江南制造总局)的创办，以及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苏州和南京创办的兵工厂的发展就是佐证。此外，左宗棠不但于1866年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而且还在西北地区大力发展兵器工业。他的部队使用的就是欧式枪炮。

这些人不仅在工业装备方面雄心勃勃，而且在设法培养能取代用高薪聘请的西方顾问、使国家实现工艺独立的中国人方面，表现更为积极。如此努力所产生的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作用，以及遭到的失败，其中期和长期后果是很难估计的。

其实，自强运动已经大大超出了武器装备和工业建设的范围。运动发起人的兴趣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扩大到西方技术和产品以外的语言、科学、制度、思想、外交、商业等各个领域。因此，这场运动又被称为“洋务运动”。反对派之所以能在19世纪末最终接受自强的提法，其根本目的无非是“用”；他们虽然意在使国家实现富强，但却不敢提出文化、制度方面的改革，即变革国“体”，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体”本质上是优越的。1860年签订各项中外条约，以及1861年清政府为处理中外事务而专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夷务”一词虽被“洋务”所替代，除部分西方事务须经朝廷批准外，其内容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不过，1895年的创伤却是十分严重的，因为中日战争的失败不仅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而且一些明白人认为，洋务运动的“实质”已不适应新的国际环境。部分激进分子甚至越来越认为洋务运动本来就不是什么善举。

“西学”方面的努力是与洋务运动的初期活动紧密相连的。为了培养必要的人才，清政府曾于1862年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此后，又于1863年和1864年分别在上海、广州开办了分校。京师同文馆虽招生不多，最多时只有125人(1888年)，但是，它却对一些出类拔萃的满、汉学生了解外国制度和思想观念起了重要作用。同文馆教习主要由外国人充任。

京师同文馆附属总理衙门，由海关出资办学，所以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于1869年任命一位名叫丁韪良(W. A. P. Martin)的美国传教士为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在其任职的32年时间里为普及“西学”做了大量工作。京师同文馆除了教授外国语言(最初教授英语，后又陆续开设法语、俄语、德语、日语)，

还在1867年增设了现代自然科学课程（这一课程是在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战胜反对派的强烈反对后增设的）。丁韪良除主持同文馆日常教学工作外，还组织翻译和出版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著作，当然，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不仅是教会，还有其他组织机构，其中最为活跃的是隶属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1868—1879年间，该馆翻译、出版了上百部著作。阅读这类翻译著作的中国读者大都是各级官吏。

为了培养掌握西学的人才，1870—1880年间，中国不但开设了不少专科学校（特别是军校），而且还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可想而知，当时这种（派学生向从前的“蛮夷”学习的）做法无疑是一种大胆行动和创新。然而，到了20世纪初，派遣学生到国外学习并接受外国的多方面影响，已经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了。1872年由李鸿章派往美国学习的，是上海同文馆毕业的30名学生。在以后的几年中，又有部分学生以见习军官和工程师名义被派到英国、德国和法国学习。

这些留学生并不是唯一到西方国家去的中国人，不少与洋务有关的官吏和文人，也都曾以考察名义或以外交官身份到西方旅行。他们以游记体裁将在西方的所见所闻介绍给中国广大读者，受到极大欢迎，并且对外交官黎庶昌、郭嵩焘、曾纪泽及文人王韬等中国优秀分子了解西方的实际情况，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王韬与上海和香港的耶稣教传教士关系很不一般，理雅各（James Legge）曾邀请王韬到英国（1868—1870年间），帮助将《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可以说，王韬一生都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他因1861年与太平军有瓜葛，为逃避官府追究，后半生除了寄居香港，就是住外国租界内生活。尽管如此，王韬通过办报，仍在1870—1880年间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王韬在那些“沿海文人”中，可以说与众不同，甚至说得上是当时的改良主义急先锋，因为他坚定不移地主张中国应像西方那样对社会制度进行深入的改革。王韬虽然远比那些谨小慎微的洋务派高级官吏积

极，但要想使自己的主张合法化，他就不得不依靠这些官吏。

我们似乎不应过分强调中国人游历西方，就是中国在向西方靠近方面有了很大进步。确实，17、18世纪的中国文人和皇帝（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人）曾为天主教传教士引进的思想、科学知识和技术所吸引，可是，他们并未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他们知道远方民族的存在，也知道那里生活的并非尽是“蛮夷”，但他们或许还没想到去那里寻求可资借鉴的事物。不过，后来这方面的转化却是全面的，因为从自强运动（从表面上看，自强与向西方学习是相互矛盾的）兴起，信赖外国产品和技术、借鉴外国社会制度和世界观，已经成了达到保国这个最终目的的必由之路。

直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运动带头人中的多数高级官吏及其追随者仍然以极其审慎的态度对待所有“实质性”问题——西方的制度和思想。然而，工业化的进展却十分迅速，并且很快超出了军工范围，如采矿、冶炼、棉纺、运输和通讯。因为这些工业部门的指导思想是富国，它们的目的就不仅仅是满足军工生产和现代化军队的需要，而且还要满足民用产品生产的需要。

随着现代化工业部门的增多，出现了另外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即以官督商办的形式鼓励个人投资兴办企业。从官督商办的字面上，我们不难看出这类企业基本上还是官僚企业。中国的现代化（至少是那些最先进的部门）实际上是在高级官吏的控制下进行的，而且他们还沿袭旧的传统法规，拒绝将与国防有关的大企业的全部责任（尤其是全部利润）留给私营部门。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官吏独揽管理和财政大权（如各大军工企业）的做法，是不符合清末国家体制的，而且由于任务繁重及19世纪末政府已无力承担这笔经费开支，必然会出现许多问题。官督商办的形式使我们不禁想起了18世纪及18世纪以前一些经济部门采取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如市场的组织和征税、食盐分配的垄断（在这方面，国家干预最多），以及部分基础部门的维持。所不同的是，在自强运动领导者创办的企业中，官吏的积极性最高，他们的干预也最多。

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商人大都属于新生买办阶层，他们是靠给外商做事发达和富裕起来的，并且始终与外商保持密切的联系。捐款不但可以获得官职，而且还可以通过他们的支持结识更多参与自强项目管理的官吏。有关清末官吏和商人势力相互渗透的后果，我们将在后面做简单的叙述。

李鸿章创办的这类大型企业之一，就是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至今，台湾招商局依然存在。所谓“招商”，原指清初延请商人参与国营商业活动。李鸿章创办的招商局不是一个传统的企业和个人的集团，而是一个合法的企业，是一个以招商集股和政府贷款形式兴办的企业。当然，商人参与企业管理这一事实，说明这类企业的管理方式是极为“普通”的。1880年，招商局因偿还贷款而开始成为纯商业性企业。此后，乃至1949年前后，招商局还经历过国有和私营阶段。

招商局的初期活动是用几艘外国旧轮船承运漕粮，与控制海上运输业的英美公司无任何从属关系。招商局成立不久即于1877年买下美国一公司的旧轮船和设备，取得了航运权，并与西方国家签订了海运协议。因为招商局始终受到创始人保护、获得商人的贷款，它很快就具备了与外国航运公司竞争的能力。

李鸿章以同样方式创办的其他企业，其最初目的也都是为了满足军队和招商局的需要。所办企业中，除为保障海运而设立的分公司外，主要有1878年成立的开平矿务局，其宗旨是向招商局轮船提供燃料。开平煤矿位于直隶，李鸿章曾出任直隶总督。开平煤矿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奇葩，然而，办矿所欠外债却在1890年后成了义和团运动期间八国联军占据煤矿的借口，并且在香港注册，成了英国的一家公司。

招商集股兴办企业的做法在初期阶段进行得较为顺利，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私人资本不足的问题日渐突出。私人资本不足的现象并不是可支配资金不多引起的（因为传统的商业和金融部门拥有大量资金，而且在官办企业影响下创办的许多现代化纯私

人资本企业也能说明这个问题),而是营私舞弊、投资不获利或获利微薄(招商局似乎例外),以及官吏(特别是李鸿章周围那些唯利是图的官吏)在企业管理方面权限扩大所引起的积极性普遍下降造成的。这类官吏中,最著名的是盛宣怀(1849—1916),他曾在棉纺、邮电、钢铁、交通等企业任职。

这批“官僚经理”不但在交涉国家借款方面表现精明,而且还擅长在同僚中集资,堪称第三次自强运动(兴办军工——1872至1885年间军工仍很兴旺和创立官商合资企业之后)的菁英。直隶省在工业发展方面最具代表性,突出表现在集中全部力量发展李鸿章的军工机械生产,即实现淮军现代化和1874年创立北洋海军上。中国的第一家铁路公司,是1887年成立的天津铁路公司。天津至唐山、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修筑工程于1894年竣工。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计划还包括在天津创办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选派年轻人到国外留学、购置外国军舰和装备,以及19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关于将直隶和北洋军队建设成中国最现代化军队的计划。

差不多就在这同一时期,自强运动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正在脱颖而出,他就是翰林院学士张之洞(1837—1909)。此人最初对洋务运动持反对态度,而且处处与李鸿章作对,他尤其不赞成李鸿章等人的对外妥协态度。然而,张之洞自1884年出任两广总督时起也开始参与现代化方面的活动了,如创办兵工厂、水师学堂、机器纺织厂,延聘具有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人士为顾问等。张之洞于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期间,曾经开设许多纺织厂。他的最大创举是开办汉阳铁厂,为京汉铁路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且他的有关奏折是在驳倒反对派的强烈反对后于1889年得到批准的。他能在这个问题上与李鸿章的态度基本一致,是因为铁路北部的计划控制在李鸿章手中。张之洞在教育现代化方面也曾做过突出贡献。他是第一批往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官员之一。当人们谈论起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时的湖南、湖北时,总把两湖说成是“洋务王国”,并且把武汉誉为“中国的芝加哥”!

由于存在着大众对洋务运动领导人缺乏信任、商人集资困难、国家负担过重、官僚控制管理、不盈利及资金使用等问题，张之洞也和李鸿章一样在活动上遇到了障碍。因为破产的缘故，在许多重大项目上最终不得不对个人利益让步。洋务运动走向失败，原因不在资金和管理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上，而在运动的最初计划，即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计划的戏剧性破产上。

失败原因与近代末期政治社会

具体地讲，这次失败有两个方面：一是中法战争（1883—1885）的失败；二是中日战争（1894—1895）的失败。有关这次失败的全部过程，并非几句话就能说清楚。中法战争从山上打到海上，打打停停，持续了很长时间。这场战争是以清军联合刘永福的黑旗军抵抗法国侵占东京湾开始的。战争期间，清军虽也取得一些胜利，但最后的结局却是中国福建水师的舰船被击沉、福州船政局被炸毁，李鸿章在天津签约，放弃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抵抗遂告失败。

中法战争期间还发生过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法国舰队司令孤拔(Courbet)在轰炸福州船政局之后开始站稳脚跟，并且阻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直至战争结束，这更使清政府对台湾的安危感到担心。台湾设省后，原淮军将领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并致力台湾的“富强”。台湾的铁路建设就是在他出任巡抚期间开始的。然而10年后，台湾终因中日战争失败而失陷，并且受日本的殖民现代化统治达半个世纪之久……

1871年，朝廷允准中日两国交往（即发展欧洲式的外交关系）；1872年，日本袭击台湾，致使两国关系因这次事件引起的纠纷而恶化。日本声称，因为琉球群岛部分渔民遭到屠杀，所以对台湾进行报复。这不过是个借口，其真正目的是想通过这次报复行动证实日本对琉球（过去曾是中国的朝贡国，事发之后不久就成了日

本的冲绳县)的宗主权。经欧洲国家的多方面调解,这场纠纷才于1874年以肯定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这种使中国满意的方式得到解决。

更为严重的,应该说是朝鲜问题。朝鲜是中国最早的朝贡国之一,也是在文化方面与中国联系最密切的国家。自明治时期起,日本就为同朝鲜签约、互派领事和开放口岸问题对朝鲜施加压力,而这些压力只能被看作是挑衅行为。中日甲午战争前20年间,朝鲜的保护国就同东亚新崛起的劲敌展开了一场艰苦的、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竞争。从表面上看,竞争的目的似乎都是使国家实现现代化、培植政治支持者。各种原因引发的宫廷事变和革命,确实对强化清朝的势力起到了很大作用,使清政府仍能继续维持驻朝军队。当时中国驻朝总理是袁世凯(即李鸿章的代理人),他后来还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

由于日本一秘密会社的煽动,朝鲜南部发生叛乱,不久便爆发了1894年的战争。为平息叛乱,清政府派兵入朝。叛乱虽被平息,可中国军队却与日本远征军处于对峙之中。中国的失败已无可挽回。首先是李鸿章的失败。因为李鸿章的部队(淮军和北洋水师)是在李鸿章在外交方面无计可施情况下才参与战争的。日军在平壤大败清兵并摧毁了鸭绿江口北洋水师的精锐部队。日军占领辽东半岛的大连和旅顺后,又占领了山东北部的威海卫,并在1895年2月对撤到威海卫的北洋水师余部狂轰滥炸。就这样,直隶总督为了对付不可避免的对抗而精心组建的军队,在短短几个月里竟被粉碎了。

清廷因日军侵犯山东,京城面临危险,遂授权李鸿章与日本议和。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对中国来说是一大耻辱,因为日本不但索取军费赔偿,而且还占领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甚至可以在中国开放口岸随便开办工厂。除此之外,日本还可以任意插手朝鲜事务,使这个国家的“独立”从此得到保障。然而10年过后,朝鲜却被日本吞并了。俄国因对满洲另有图谋,遂在

法、德两国支持下以3000万两库平银为条件，迫使日本交出辽东半岛。

中国对法、对日两次战争的失败，揭示了自强运动破产的第一个原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即中国军事力量分散。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存在。遭受严重打击的不是“中国”，而是以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为中心的福建水师和李鸿章的军队，特别是北洋水师。李鸿章的军队缺乏指挥经验、训练方法过时，这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帝国海军各部（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州水师及广州水师），无论是指挥方面还是装备方面，相互之间从不协调。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南洋、福州和广州水师都在隔岸观火，按兵不动。各军工厂在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和供货商的影响下组织生产，所以产品无法满足需求，以致不得不继续从国外进口舰船和武器。19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50余艘现代化舰船中一半是从国外进口的。此外，中国在进口外国舰船和武器方面也缺乏集中统一，往往根据购买者临时筹集的专款购买，这就为西方军火商暗中捣鬼打开了方便之门。

总而言之，中国在军事和工业的现代化方面缺乏强有力和集中的指导。为了说明这次失败的原因，或许还应该就政治制度方面做更多的阐述。其实，决定性因素既不是经济，也不是知识，更不是文化。中国并不缺乏人才、企业精神和资金。即使在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遇到空前的资金困难以及中国某些地区遭受严重灾害时（如1870年前后华北地区出现因特大旱灾引起的严重饥荒），商贾和官吏中腰缠万贯、随时可以出资者仍不乏其人。这对兴办合营企业来说是个最起码的有利因素。此外，孔子文化并没有把人们常说的“文人的阻挠”与科学技术现代化对立起来。我们曾提到过1870—1880年间各界翻译和出版西方著作的情况。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最近在研究福州船政局时也曾指出：一旦中国方面知道如何同外国（法国）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技术引进就可以在一些令人满意的条件下进行。至于企业精神，

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商界存在这种精神，但问题的关键是不能把这种精神用在投机和再分配上，而要用在独立掌握技术和长期盈利，以及提高产品质量(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注重产品数量)上。

我们认为，自强运动缺乏集中统一的指导并非仅与历史原因(如反叛斗争初期地方官吏所做的努力)有关，其主要原因，无论是从直接意义上看还是从普遍意义上看，都属于政治原因。如果1860年以后掌握大权的是康熙或乾隆(或者明治)这样的皇帝，情况又会怎么样？当然，这样提问题似乎没有道理。但事实上慈禧太后长期执政期间(我们不否认她具有国务领导人的才能)，她的一些活动，如分而治之、维持朝野各派势力的平衡等，目的不是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而是维护一种非正统的个人权力。慈禧太后及其宠臣常在改良派和保守派之间制造矛盾。保守派常以某一位总督为靠山，因为总督是一省之主，权力很大，这也是清朝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正是因为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人掌握一省或几省的大权，并且推动和支持所辖省区的现代化建设，在地方上遂出现大批既不受任何束缚，又不考虑实用和技术一体化的军工企业，而且这些企业都在设法尽可能广泛地利用现有资源。

更为严重的是，现代化的尝试不仅支离破碎，而且与社会、经济和行政管理部门相比，不但没有受到青睐，反而遭到了冷落和摒弃。当然，在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并非小人物)中，提议参照西方体制对中国制度进行改革的也不乏其人。从体制改革这个角度看，首先应该改革的，是各级官员的聘任制。1860年以后，李鸿章就发现了中国的一大明显弱点，即谋取官职所应具备的“崇高”学问与生产技能和国防知识相脱节，为此，他建议科举制度中增设科技知识考试。李鸿章的门生丁日昌在这方面步子迈得就更大。他建议把半数以上的优秀考生培养成熟悉外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专家。然而，他的建议却遭到坚决反对，而且直至1905年科举制彻底废除，考试的内容和组织形式始终没有改变。

他的建议之所以遭到反对，是因为他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想消除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社会感召之间的对立。我们知道，当时日本就是这么做的。

本着体(Substance)用(instrumentalité)有别的精衿，把现代化限制在制度以外，这种想法在清流派反对洋务运动的政治主张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清流派通过“上疏言事”，针对中国面临的外来威胁，提出了如何维护中华帝国在精神、制度和领土方面的完整的办法。清流派常以令人敬仰的传统为荣，他们都是官僚出身，而且属于大都市官僚阶层，与各省同开放口岸有联系的“地头蛇”不同。他们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就像沙场上的勇士，从不主张妥协，并且反对那些实用主义者及李鸿章等只知道对列强妥协让步的人。他们这种不妥协态度并非一事无成——如在收复新疆问题上，他们支持左宗棠。然而，这种不妥协态度也会产生另一种后果，如中法战争期间，清流派的某些代言人曾率先抵抗，并且提出过类似统一指挥和统一防御现代化的积极建议。可是，战争结束后，由于在福州遭到惨败，以及台湾被困，清流派不得不暂时退出舞台。

其实，清流派的态度既不是绝对，也不是盲目反动的。确切地讲，他们不过是担心甚至害怕削弱传统的道德观念、打破文化这个缺口和放弃主权。如果他们能和其他人一样，希望中国强大，并且对西方的物质优势有着足够的认识，他们就不会无休止地批评对立派有关发展工业、军事，特别是教育的计划，不会千方百计地攻击对方，不会提出一些极端保守的反建议并成功地推翻了一些重大计划（如1880年呈送皇帝御批的北京至清江浦铁路建设计划）。事实上，抗法战争失败后，清流派中的不少人（最为突出的是张之洞）开始转向赞同自强运动的现代化设想，但仍然千方百计地坚持中央政府和舆论对自强运动的严密控制。而李鸿章及其支持者则对舆论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

如果凭想象断定由现代派和保守派这两大阵营构成的清末政